

# 編後語

時光荏苒，《二十一世紀》已經有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歷史。《二十一世紀》二十五年的春秋，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國思想文化界和公共空間的變遷。在創辦之後的第一個十年，由於特殊的歷史背景，《二十一世紀》在中國知識份子公共空間中，扮演着擎天柱的角色，引領公共話語的基調和建構。然而，在近十年內，由於外在和內在因素的變遷，《二十一世紀》作為公共空間擎天柱的角色不再，開始向綜合性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術性刊物轉型。

所謂外在因素，是指在知識界之外的社會變遷。首當其衝的是互聯網的穿透性造就了新媒體的興起，使公共空間一方面急速膨脹，另一方面急劇多元化和民主化，著名知識份子在公共空間的主宰性有所降低。進而，社交媒體的興起又使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交融，並使公共話題的營造和傳播一方面急劇快捷化，另一方面急劇封建化，致使公共空間不得不適應於「低頭族」（即手機閱讀）的生活形態。與此同時，傳統媒體為了應對網絡時代的新挑戰，紛紛採取一些有力策略，以期在公共空間繼續佔有一席之地，其中各種報刊所開闢的深度時事分析和公共討論，涉及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思想和國際事務等諸多領域。

所謂內在因素，是指知識界本身的結構性變遷。一方面，公共知識份子在內部日益碎片化的同時品嚐着被妖魔化、漫畫化和娛樂化的後果，另一方面，海內外學人在學術全球化的大潮衝擊下日益走向分科化、學院化，學術規範和分析技術日益與國際接軌，各學術領域的學術成果開始在國際學術界登堂入室。簡言之，隨着專業性的不斷增強，公共性在學術界早已成為一種奢侈品，其生產一方面依賴於相關知識人精湛的專業素養、深切的公共關懷和過人的文字功夫，另一方面也需要汲取市場營銷和傳播之術，營造吸睛的效果。

應對這些結構性變遷，《二十一世紀》的重新定位至關重要。在思想文化公共空間日趨快捷化（甚至「屌絲化」）、多元化（甚至封建化）、專業化（甚至技術化）、全球化（甚至去本土化）的大潮衝擊下，《二十一世紀》可能的立足之地就在於為「具有公共性的學術寫作」提供發表媒介。「學術論文」欄目的份量日益強化，其中的論文一方面具有學院派學術作品的水準，另一方面也包含着直擊公共話題的內容，或具有深切的公共意涵。

本期「學術論文」欄目的各篇論文，均程度不等地體現了某種公共性。秦暉和陳建華之文，論述了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前後中國知識界和文化界激進主義和非激進主義的交鋒及其思想根源。沈志華之文是即將刊出的五篇宏文中的第一篇，揭窺了朝鮮內部的派系鬥爭及其與中朝蘇三國關係的關係。宋鑽友之文討論基礎設施建設對於國民政府戰後國家建設的意義，而這一意義直到今天一直在延續。林鵬書寫的大饑荒期間的南京棄嬰史，就社會亂象的治理，既可為政界（尤其是地方政府）提供資治通鑒，也可為公共政策學界提供資思通鑒。